

北海文史

第二辑

北海基督教史略

北海市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领导小组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满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订立了“烟台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把宜昌、芜湖、温州、重庆、北海开辟为通商口岸。”从此,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商船,不但可以在北部湾(旧称“东京湾”)的海面上横行无阻,而且在北海市内立海关、办洋行、设领事,进行经济,政治上的侵略活动,同时天主教、基督教也相续传入北海。这就是当时基督教传入北海的历史背景。

一

满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烟台条约”后,大约在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基督教便开始传入北海。首先来北海的是英国安立间教会①的英国籍的柯达医生夫妇,在祥懋里附近的地方开设一间医院——普仁医院,一面行医,一面传教。当时做礼拜的地方,就是在医院候诊室的一间小礼堂里。不久也在医院左邻设立一间麻疯院,招收几十名从合浦所属各地的麻疯病人,一面治疗麻疯病人,一面传教,发展教徒。并教习手艺、印刷、编织竹器,制造家具,出售市场,帮补生活。北海原来只有“太和医局”、“爱群医所”两间中医诊所到这时才开始有西医治病。由于柯达医生的医术高明,行医不久,便受到当地群众的信仰,医药事业比较兴旺,也发展了不少教徒。后来,柯达医生因水土不服,便束装回国。继柯达医生来中国的是李惠来医生夫妇,据说李的岳母是一个拥有七、八艘大轮船的企业家,经济力量比较雄厚,对他给予很大的支援,他到北海后继续行医传教,打好了发展教会的根基。他还亲自深入广西、云南等地,在云南昆明创办医院一所。约在一九一〇年由英国购买印刷机一台给麻疯院轻病人印刷书报及小学教科书,是北海有史以来首先使用机器印刷,对当时传播文化有一定的影响。李来北海后,由于教徒的人数日增,在医院的礼堂

做礼拜显得太挤了，一九〇四年，便在医院右邻的地方建立一座比较宏伟的礼拜堂——“圣路加堂”，当时建这座教堂，曾发动过当地的教友募捐，但大部分经费都是从英国安立间教会差会供给的。至此，英国教会在北海的发展便有了比较完整的规模（从现在的三小到人民医院，后面从医院的传染科到紧接北中都属教会的范围）。其中有普仁医院的门诊室、留医室、手术室两大座、医生楼一座和周围的药剂室、检验室、护士宿舍等多间。疯院这边也有小礼拜堂一座、用房六座及单人宿舍多间。圣路加堂这边有大礼拜堂、副堂（纪念楼）和会长室各一座及办学的校舍两座，还有小平房多间。从此会务日益发展。以后也在礼拜堂后面办起了“贞德女校”，招收妇女学习文化，并教学员学会罗马字，利用罗马字作为拼音工具进行识字，和阅读罗马字的拼音读物。这对当时解放妇女思想，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范篱，是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的。由于会务的发展，李惠来医生夫妇兼顾不暇，差会便派英籍传教士陂箴夫妇来协助，负责传教事务，圣路加堂的兴建，也是由他奠基的。李医生便专职负责医务工作。李医生夫妇在北海生了一个女儿，后来跟她父母回英国，长大了又被派来北海传教，一直到1947年才回国。

圣路加堂受英国差会派遣的第一任牧师叶××，他夫妇于1912年来到北海，在这里传教四年，他的师奶是在北海逝世的，当时还葬在教会的坟场里，叶的师奶死后，便于1916年回国。继他来北海的第二任牧师是兰哲，以后还有麦坚士、刘××等英籍牧师。

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由于是靠不平等的条约进来的，有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中的少数坏人，往往凭借帝国主义的势力，作威作福，因此造成人民群众的极大反感，常称呼信基督的人是“吃洋教”，甚至引起各地产生一些“教案”。如“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就是镇压“义和团”杀“洋教士”的一场战争，此后几十年因基督教而引起的“反帝”事件也连续不断。一九二六年，全国也产生一场“非教”风潮，这一风潮也蔓延到北海，当时这里也出现“砸教堂”、“驱洋人”^②的事件。这时，中国的广大爱国教徒已认识到依靠不平等条约传

教，对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纷纷要求教会独立自主，不受外国差会的支配，英国安立间教会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把自主权勉强交给中国的教牧人员。从此，安立间教会也和全国魄“圣公宗”一样，改为“中华圣公会”，并把北海的“圣公会”划入“港粤教区”管辖。按照圣公会的体制系统是：会督——会吏长——牧师——会吏(传道)但当时港粤教区的会督何明华，副会督候利华(都是英国人)，实际上教务，经济大权仍然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以后也封立一个华籍教牧人员莫寿增为会督，负责管理港澳和广东各地“中华圣公会”的会务，英会督曾几次到北海来视察会务，最后也是在北海逝世的，并葬在北海圣公会的坟场。

北海圣公会“圣路加堂”的第一任华人牧师是夏步云，夏调离后接替他的 是黎其壮，接着是黄福平。抗日战争以后，担任圣路加堂牧师的是梁清华，接着是叶日青。抗战胜利后由张绿芴接替，直到解放前夕才调离北海往香港任圣公会的牧师职，由刘坚信调来接任牧师职务，直到一九七一年病逝。

圣公会在北海打好根基之后，为了发展传教事业，招收新教徒，便向市区外围伸展，除了在市区的山东路开设一间“福音堂”(解放前曾租给豪光照相馆，解放后被百货公司折毁建百货大楼)外，还在地角设过布道所，在高德外沙四街开设一间“福音堂”，在赵屋岭设立“西门堂”派传道人负责传道和教学。在中山公园附近的“双孖楼”，原来是英国领事，领事撤消后也交由圣公会使用，解放前租给“旭初中学”(解放后改为“新民中学”，后给六小占用)。以后并深入合浦内地，初到廉州时，也是用医疗、助产为先导，在城内小北街建一座小洋房，派英籍牧师魏××主持宗教活动，附设临时医务所，逢星期三、六两天，由北海派医生去门诊，另设接生所，以便随时接收产妇。大约于一九一二年间，在城外小南门文昌面东面买土地一幅，开始建教堂，名叫“圣巴拿巴堂”，又在城内大街，增设一间福音堂，作为晚上对群众宣传“福音”之用。以后还建立了“基督之友社”，供教友子女和社会青年阅览图书和娱乐场所，以便发展青年教徒。该堂的 第一个华人牧师叫许公燧，后来继任的是一位女牧师李添爱，她

除了传教之外，还为当地青年辅导英语，并兼任廉中的英语教员。该会在廉州的最后一个传道人黎炳桑(新会人)，解放初，合浦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停止了宗教活动，他便于一九五二年迁回新会。此外，圣公会还在合浦常乐开设过福音堂，负责传道的是当地的教徒。

圣公会抗战前在钦州也设有教会，抗战后，因无人负责而收缩了。由于圣公会的传教范围广阔，因而当时港粤教区便在北海设了一个“钦廉区会”，区会设会吏长，管理合浦，钦州各堂会的会务。在抗战期间，调派来的第一任会吏长是慕容贤，抗战胜利后，接替慕容贤任会吏长的是曾纪岳，直到解放前夕，他和张绿萝同时调往香港圣公会任职，接替他任会吏长的江之永，至一九七四年他申请批准往香港探亲，在港病逝。

圣公会的附属机构——普仁医院，自李惠来夫妇回国后，还有一个英籍医生叫罗素的调来主持医务。安立间教会改为中华圣公会后，普仁医院也由中国医生负责。任第一任院长的是沈永年(上海人)，他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护士和助产士。如当时的陈华东、陈世光、陈桂初、钟××、陈雪清(女)等人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接替沈永年的是林球璋，但他主持医院不久，在抗战初期便辞职回香港私人行医。接着是一个奥地利国籍的医生米尔智，但任职不久又调离了，继由中国医生朱国京任院长。抗战胜利后，由慕容贤会吏长聘请林怡贤、林茵夫妇两人主持普仁医院，至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接办普仁医院改为市人民医院后，他俩任医院的副院长和内科主任。

白屋医院是在一九三七年建成的，当时还是经沈永年的手兴建的，兴建时，柯达师奶还从英国来这里举行奠基礼。建成之后，便把麻疯病人迁至白屋医院。以后英国差会还派一个英国人胡理德来作监理人。这时白屋医院已有不少的教徒，但没有自己的传道人，每周教徒做礼拜，都是圣路加堂的牧师去主持。后来方在麻疯病人中封立熊家振做牧师，领导院内的教徒过宗教生活及生产业务，一贯在麻疯病人中拥有很高的威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因受残酷批斗含冤至死。

圣公会除传教之外，还设有学校，招收教徒子女及附近居民的子女入学。

自贞德女校停办后，在抗战期间便利用这些校舍办起了圣公小学和幼儿园。小学一般是单班制，学生人数最多时是四百余人。一般是二、三百人，教员约10人。校长由圣公会的牧师兼任，以后何季彭、曾子焯也任过该校的校长，教员多为教徒如麦国辉、梁元三、潘恩德、李玉珩、黄玉馨、江慎英、陈大卫等，也有教外的如陈秉洁、黄同信等。该校一直办到一九五二年才由政府接办，改为北海市第七小学。

在抗战期间，广州失陷，当时由圣公会办的圣三一中学(初级中学)迁到北海，用麻疯院旧址继续招生办学，先后由陈德隆、陈大卫(广州人)任校长，教员多在这里就地招聘，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广州。

“信义会”原来叫“长老会”^②，其总会设在德国，总监督为王宝三(德国人)。该会也是一八八六年传入北海，首次派来的德国教士巴顾德，在北海“崩沙口”(即中山东路起点)买地一大幅，兴建教会楼房，有西式大楼二座(一座供德国教士居住，一座招待来往德国人住宿)，礼拜堂一阕，男女客厅两间，传道入、职工和学生宿舍十余间，以及印刷馆一所(现在这些房屋已由市公安局使用)。长老会在传教的同时开设印刷馆，用铅字活版机器印刷教会宣传刊物和中文圣经单行本，并承印外界刊物，这是北海最早的一间用铅字活版印刷的印刷馆，后来北海开马路，这间印刷馆被拆掉，教会将印刷机卖给合浦书报合作社。

长老会传教事业同圣公会一样，先在北海扎稳根基，再向合浦内地推进，分别在廉州、南康、福成、党江等圩镇相继建立教堂，扩大宣教范围。

在长老会期间，由德国西差会派来的德国教士除巴顾德外，以后还有蓝××牧师夫妇、洪道文牧师夫妇、老戴××牧师夫妇、杜道芳牧师夫妇、荣观莲姑娘、连××姑娘等十一人。

约在一八九九年，长老会改称“信义会”^④，因为廉北属于广东南部，故称“粤南信义会”。这个时期从德国西差会派来的德国教士，先后有罗××牧师夫妇、欧沛曼牧师夫妇、鲍间巽牧师夫妇、黎美德姑娘、戴天康牧师夫妇(即长老会老戴牧师的儿子，出生在合浦南康教会)和嘉里奥牧师夫妇(芬兰人)等共十

一人。

以北海为传教根据地的长老会，除由德国派驻教士主持外，有中国传道人潘马可、龙提摩太，改为“信义会”后，有传道人李达一（后提升为牧师）和谭文晃。谭后来调离北海往福成等地继续担任传道工作。一九五〇年粤南总会派张一新来协助李达一牧师搞传道工作。

鲍间巽接欧沛曼之任，被提升为廉北教会总监督。他在任时，再在北海教会后幅空地建起了教室三间，正式立案后，办为高小学校，名为“中德小学”，从广州聘来陈寿源为校长，潘筱川、李达一等人任教员。抗战后，因北海疏散人口而停办。到抗战胜利后，约在一九四七年，又继续办“信义小学”，李爱兰任校长，何家殉、廖莲等任教员。到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因经费短绌才停办。

鲍间巽在任时，于一九四一年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事变，它和德国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因此当时政府下令沿海一带的德籍人员，都要迁入内地，于是鲍间巽夫妇和黎美德、荣观莲等人奉命迁往粤北乐昌。临走时匆匆封立李保罗、李达一为牧师，继续分别主持廉北各教会会务。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鲍间巽等人由乐昌返回廉北重整旗鼓，把粤南信义会中心转移到合浦，称为“粤南总会”，但这时德国西差会在经济已无力支持。这时美国便操纵世界信义宗联合会，以救济“海外孤儿”为名，通过经济手段，继续控制中国的信义会（该会重要成员可向上博士曾来视察过），芬兰籍嘉里奥牧师夫妇，就是这时候由美国的差会直接派来的。

抗战胜利后的信义会，除传教外，继续扩大文化教育事业，在合浦增设图书阅览室，开办幼儿园、孤儿院，成立青年会，还租赁林家祠兴办“信义小学”，聘廖旭为第一任校长，招收学生百余人。同时开办业余夜学班和“男女神道班”（圣经学校），招收青年教徒，培训教会人才，为教会服务。

解放后，黎美德把由她在合浦教会办的孤儿院迁来北海，教会走“三自”道路后，黎申请回国，孤儿院停办。当时市民政科指示，孤儿凡有亲人认领的，尽量让人领回，剩下几个十岁左右的儿童，由民政科收入教养院，孤儿院的家

具物资由民政科接收，工作人员由政府另行安排职业。当时的工作人员除黎美德外，尚有张路德、李爱兰、何作骧、张一新、黄德爱等人。信义会从成立之日起，到一九五一年北海基督教发表“三自革新”宣言之日止，长达数十年依赖西差会接济的历史，这时才宣告结束。

“五旬节圣洁会”，是“五旬节派”^⑤教会其中一个小教派。是由美国人办的。它的前身叫“新约教会”。新约教会也是由巴顾德创办的。巴顾德是德国人，原是长老会的牧师，因犯错误被开除出长老会，于是他又钻营到新约教会的差会，出资在北海朝阳里买地一幅建有礼拜堂一座，外籍教士住宅(洋房)一座，传道人住宅(平房)一座，教室两座。还有职工、学生的平房宿舍数间，是以后五旬节会建的。巴顾德回国后，还有一两任牧师继任传教。当时还在廉州下街租赁房屋一间作传教和办小学之用。但开办约四年便停办了。在新约教会任过职的中国传道人马叔贤、何作骧等人。新约教会停办后，何作骧便转入信义会。

大约在一九二三年间，五旬节教派的美籍牧师殷惠廉，从美国来到香港，创办“五旬节圣洁会”后，便到北海来接办新约教会，改名为“五旬节圣洁会”，他在北海传教不久，又被美国差会调到上海去开办教会(但上海的五旬节会和北海并没有隶属的关系)。殷惠廉调离北海后，由美籍的女传教士皮××姑娘和伦罗兰姑娘来接任。一九三〇年前后，皮××姑娘回国，差会派加拿大籍的传教士李佐治牧师夫妇和伦罗兰在北海管理教会。一九三六年，伦罗兰和李佐治夫妇先后回国。由美籍传教士许理佳牧师夫妇来接任，不久又派来女传教士薛以道。在抗战期间，北海形势吃紧，不能长驻北海，便以香港五旬节会为据点，遥控北海五旬节会。太平洋事变发生后，他在香港被俘，一九四二年日美交换俘虏时始得回国。抗战胜利后，他再从美国来华，恢复香港和北海的教会。但到一九四八年夏去香港避暑，因全国许多地方均已解放，他便驻在香港不再来。

五旬节圣洁会在北海建立了据点后，除由美国派驻教士主持外，并先后有中国的传道人邹道年、蒙恩光、何永章、潘惠慈(女)、徐保罗、黄冠三等人协

助传教。黄冠三原是钦州五旬节会的信徒，是由李佐治亲自培植、五旬节会第一个正统的神学生，他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梧州建道圣经学院，派回北海任传道，李佐治回国后，仍由他协助许理佳工作，许理佳不在北海，一切会务均由他主持。直到一九四三年，北海海面因受日寇骚扰，市况萧条，便转移到钦州的五旬节会去。北海教会交由他的弟弟黄惠明维持。一九四六年，许理佳重来北海恢复教会时，并派苏志超从香港教会回来任传道，一九四八年苏因乘船往钦州料理会务，在海上遇劫，受枪击丧生。继由黄挺超接任直至北海解放。

五旬节会规模较小，它的会务范围主要是传教，但其间也断断续续办过一些小学。如新约教会时办过“美华小学”，但学生只几十人，不久便停办了。一九三一年五旬节会还请来一个女传道梁信基来协助传教，她爱人何殿材便在教会内私人办起一间“教约学塾”，招收学生数十人。但翌年，梁信基因受到徐保罗的排挤，愤然离开教会，何亦随其妻离开，在东二路另租房屋设馆任教。到一九四七年，教会才向当时的东镇镇公所立案，开办“建光小学”，由袁瑞华(女)任第一任校长。一九四八年袁瑞华返香港，继由黄挺超任校长，张文华任教导主任，教员有王子鸣、黄翠琼、黄作城、王英兰、潘惠远、萧慕贞等人。一九五〇年三月，黄挺超调离后，由陈大卫接任校长，教员有苏定球、苏懿中、罗平、萧慕贞、苏吟拿等。同年下半年因办学经费筹措困难，只得停办。

五旬节会以北海为传教的据点，也向外围发展。最初是在钦州竹巷买地一幅建立一间礼拜堂，前厅作为教徒做礼拜和对外宣传福音，后厅为教徒晚上做祷告、查经之用。邓清舫、欧阳辉等人都曾在这里做过传道。一九四三年黄冠三从北海入钦州后，一直在该会担任主任传道。解放后，因五旬节会从来没有过中国的牧师，发展教徒施洗和主领圣餐，都缺牧师主持，当地的教徒只得封立他为牧师，但没有履行过教会规章制度中按立牧师的手续。

除钦州外，在东兴和合浦的西场也有一段时间设立过“福音堂”，进行宣传布道，但因缺乏人员负责主持和进展不大，故不久便撤消了。一九三六年，也在梅录租赁房屋开设一间福音堂，派中国传道人陈博文在那里主持，陈博文调

离后，由女传道潘惠慈继任，直至一九四四年在梅录逝世。一九四六年，许理佳重来恢复教会后，便由苏志超、黄挺超经办，在梅录太康路买了廖姓的一座房屋修建为福音堂，由黄挺超任传道。一九四七年黄挺超调来北海，由陈大卫前往继任。一九五〇年初两人又分别互调回自己的家乡任传道。

许理佳为了发展传教事业，培养一些青年教徒受到初级的神学教育，以便担任传道职务，在香港和北海都举办过圣经学校，由北海、钦州、梅录等地教会选派青年教徒参加学习(香港的圣经学校由香港各堂教会选派)。许理佳任校长，教员有许理佳的师奶许珍珠和女传教士薛以道，中国传道黄冠三、许的翻译员罗传烈、国文教员徐文(女)等。当时的学员有苏志超、黄惠明、苏哈拿、黄挺超、黄爱虔、陈大卫、王家钦、梁五姊、廖宏才、符珍甫等人。这些学员如黄惠明、黄挺超、陈大卫、苏哈拿等毕业后都分别在教会做了传道，(苏志超参加学习不久，便往香港教会做传道)有些由于其他原因不能读至毕业便离开或另做其他职业了。

二

北海的基督教会和全国的基督教会一样，虽然在三十年代便已提出实行“三自”，但是，能真正走“三自”爱国的道路，实现“自立、自养、自传”和“爱国、爱教”两全的、还是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做到。尽管在解放前，外国差会的传教士，逼于中国教牧人员和教徒的觉醒，提出“三自”的呼声日高，不得不在表面上给我们一些“自由”封立一些中国传道人为牧师、主教，让各教派之间互相联系，如当时北海三个教派每月举行一次联合祈祷会，圣诞节互报佳音，在抗战期在美国“救济总署”的组织下，联合举办物资救济点等，都曾做过了一些工作，但是教会经济、行政的大权，始终掌握在外国传教士的手里，教会很多重大的事情，都是解放后，全国基督教在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倡导下，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发表“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全国各地教会纷纷响应，我们北海三个教派也联合组织学习，经过充分酝酿协商，起草宣言，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假座“娱乐戏院”，隆重举行全体教徒联合大会，

参加大会的共四百多人，并有有关政府部门的首长、干部列席，会上庄严宣读《北海基督教联合会为拥护全国基督教革新运动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大会宣言》，在这个宣言上参加签名的，有以林怡贤为首的教徒共四百一十八人。会后并组织游行。这是北海基督教会获得新生的大喜日子。事后，钦州专区办的《每日新闻》也报导这次联合大会的盛况。

广大教徒自参加三自革新运动签名后，大家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我们教徒的爱国并不后人。在这之前，北海市进行认购爱国公债的宣传动员，我们几间教会和教徒都以集体或个人的名义踊跃解囊购买爱国公债。党和政府号召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我们教徒亦尽自己的能力积极捐献。

一九五一年四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示教团体接受外国津贴的处理办法》后，北海三个教派便即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外国差会割断经济联系，不再接受它们的津贴。除圣公会的经费来源于华南教区，教牧人员仍可专职受薪外，信义会和五旬节会的传道人都另谋职业，依靠工资维持生活，采取“义工”的方式，用业余时间，做教会的工作，坚持走“三自”爱国的道路，不再接受外国差会的津贴。

经过三自革新，教牧人员和教徒都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关心国家大事，建立了政治学习制度，定期组织学习政治时事，积极依靠当地统战部门的领导，邀请党政首长或干部对全体教牧人员，教徒作时事形势报告，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遵守政府的政策法规，做一个爱国爱教的基督徒。

一九五四年，广西省召开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一次会议，江之永、刘坚信、陈大卫、张一新都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全国三自运动的会议精神和听取省统战部首长的形势报告和讲话，及制订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章程，成立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我们参加会议回来，即向统战部门汇报，并争取支持召开北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一次代表会议，传达

全国和省三自会议的精神，并选举产生北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成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了江之永为主席，陈大卫、张一新为副主席，秘书刘坚信，主持开展三自爱国运动，这次会议当地党委的统战部门和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都很重视派干部参加会议并讲了话，省三自会亦派吴英才先生前来指导。

一九五五年夏，广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织全省的教牧人员举办暑期学习班。江之永、刘坚信、陈大卫、张一新等人也被邀请参加学习。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基督徒所走的“三自爱国”道路是正确的和开展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各种罪行，坚决和西差会割断一切联系，不再受他们的支配。在这期间，我们在北海也举行了揭发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控诉会。同时政府所举行的爱国运动都积极组织教徒参加，如参加“五、一”、“十、一”的节日集会和游行，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残酷判决进步人士卢森堡处电椅死刑和无辜杀害黑人牧师马丁路得·金等。

一九五八年，教牧人员和教徒也积极投入大跃进运动，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本职的工作，同时三个教派组织大联合，同在一起进行礼拜聚会，过宗教生活，真正实现基督教的大团结，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由于基督教自觉起来革新，积极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因而逐步改变了当地人民群众对基督教徒的观感。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一条极左的路线，因而虽然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各战线、各部门的基督徒，往往仍受到暗中的歧视，而且牵涉到家庭儿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更是倒行逆施，公然践踏宪法，因此，天主教、基督教便成了横扫的“台风中心”，在各单位的基督徒，都被作为“牛鬼蛇神”来批斗，几乎无一幸免。天主教、基督教被作为反动会道门组织来捣毁，一切资料、档案、家具都被洗劫，荡然无存。甚至举办什么天主教、

基督教罪行展览会，玉石俱焚，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基督教教牧人员，无所不用其极，使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一个个成了“凉弓之鸟”，党的宗教政策被破坏殆尽。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随着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也逐步落实了。这几年来，全国各地几乎每两、三天就有一、两处教堂开放或重新开放。北海市基督教会也于一九八一年六月重新恢复三自爱国运动机构，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在积极筹划重建教堂的工作。相信北海的基督教徒朝思暮想坐在新教堂里同赞主恩场面的出现，将指日可待矣！让我们珍惜这颗失而复得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明珠，让它永放光芒吧！

(陈大卫执笔)1988年8月16日脱稿

附注：

①安立间教会——基督教新教圣公会的别称，起初单指英格兰圣公会，后亦泛指各国圣公会。“安立间”是英文 Anglican 的音译，原意为“英格兰的”。因圣公会起源于英格兰，故名。

②驱洋人——一九二六年，北海人民在第十师的支持下，驱逐了董恩典(英女传教士)和“啤路鬼”这两个依靠帝国主义势力，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分子。

③长老会——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该派的组织原则，由教徒推选长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故称。

④信义会——遵奉马丁·路得“因信称义”教义的基督教新教会。属于路德宗(即“信义宗”)。主要分布于德国北部、北欧各国和美国。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除少数教会使用“路德宗”名称外，大都使用此名。

⑤五旬节派教会——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流传于美国、加拿大、英国、丹麦、挪威和瑞典亦有传播。主张继承基督徒在五旬节接受“圣灵”的传统，故名。此派尚包括在组织上互不统一的许多

独立教会，诸如“神召会”、“使徒信心会”和“圣洁会”等。

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